

Z 紫地丁文丛



未完的 人生大杂文

耿庸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Z 紫地丁文丛

耿 庸 著

未完的 人生大杂文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 耿庸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0

(紫地丁文丛)

ISBN 978-7-5360-5410-3

I. 未… II. 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043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胡雅莉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紫地丁文丛》

林贤治

大地养育生命，也养育了文学。

文学与大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记载中看出来。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特别生动而鲜明。后来，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所垄断。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级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

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要使文学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不是没有因由的。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对于作家来说，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为此，他们真切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这时的文学，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可是，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部分蜕去意识形态的硬壳，而重返大地之上。至八十年代中期，无论韵文或散文，几乎同时开始了新的畸变。文体的细化，对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本来便没有什么好处。就以散文论，粗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倘从后者特意划出“艺术散文”或“美文”之类加以培植，难免流于狭窄和荏弱，全然不见自由的大精神。有人标榜所谓“大散文”，恰恰不是从精神的要求出发，惟是依赖题材，有一类“文化散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这类散文，缀连文史掌故，发掘废墟故址，把时空距离尽量拉大，在“陌生化”的途中，变着戏法贩卖陈腐的帝王思想和臣仆思想（在这方面，尤以电影电视界为甚）。还有描叙不同地域不同民俗者，食也文化，色也文化，实际上与消费主义时尚合流。此外，就是追求形式上的“大”，篇幅冗长，结构庞杂，文风铺张夸诞。总之，“大散文”的病根，盖在于脱离大地，脱离底层，脱离实际生活，以致失去痛觉。

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广义的散文，不拘记叙、抒情、议论，不限文章、日记、书信，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这其中，有泥土的沉重、朴实、芳香与苦涩，有水的柔润，也有干旱及焦渴。地丁是一种野草，地丁是“地之子”，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紫色，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紫花地丁原产中国，具本土性，民间性，全草入药，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的良药。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但似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这里拿来作丛书的名目，用意强调它的野性，与大地的联系；究其本义，简括一点说，也就是为人生罢。

是为序。

序

路莘

本书原由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初版，承花城出版社及林贤治先生好意，得以再版。此次增补了几篇文稿，其中《回忆童晴岚》一文，写于 1980 年，我是在耿庸 2008 年元月去世后整理他的文稿时，在一些零乱的纸堆里看到的，之后交于《厦门文学》于 2008 年第 6 期发表。这篇回忆文，不仅是他对于年轻时的诗人朋友的怀念，也写出了他早期的一些生活和写作经历。另外一篇《温枫其人》，写于 1991 年，曾收入了他的杂文集，此次特收入本书。温枫的名字，在今日也许少有人知，我所知也并不多。今年 4 月，我为查找耿庸早期作品，到了重庆，在重庆图书馆，我看了大量胶卷影像，我在《商务日报》等报纸副刊上看到聂绀弩、耿庸、秦牧、秦似的名字外，也看到温枫的名字不断出现。之后，我在福州福建省图书馆，在台湾的《公论报》等报纸上查找耿庸的作品时，也看到温枫的名字，我并不十分了解，温枫先生是怎么会去台湾，又怎么会回到上海。但我知道，耿庸与温枫在重庆时就同在中华书局工作，后又同在台湾，后又同在上海。他们是有着较深的朋友情谊的。这篇文章虽然简单，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感情和对友人淡泊名利的性情的赞赏。

此次增补的另外几篇，是耿庸写于文革时期一些文字。这些文

字是他在1968年间“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时所写的交代。平反后得以发还。在此后的岁月里，至少在我和他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不曾再打开看过。我想这并不是因为遗忘，也并不是不能承受内心的伤痛。更多的因素，我感到是因为这些文字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产生于被动的不以他意愿而进行的情形之下。而我也不想去触动那一份记忆，因之从未曾看过或提起。所以一直封存。在他去世后，在整理书房的东西时，我首次打开了这些封存的材料。读着他在特殊时期写下的这些文字，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挚爱。在《我和胡风的认识和交往》中，他写到了他与胡风往来，尽管他说与胡风有意见不一的地方，但他承认“我以胡风为不渝的朋友”，这是一种朋友情意，也更是他的为人作风和处世态度。而《我在押时期和释放以来的思想》中，不仅写下了他对家庭的悲剧的痛心，也有他对于文学信念的执着。在《出狱后与父亲的通信》和《关于我的家庭》中，他提到了他的父亲、他的已故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文字中无不渗透了一个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的人交织于心中的爱与负疚和无奈的痛楚心情。我将这部分文字整理发表，是想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他的思想、为人和情感。

在初版文稿中，涉及到个人经历的内容并不多。此次，我将相关几篇整理之后收入本书，我所写《同行的日子》也附于书中，以此能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有更多的反映。我非常感谢花城出版社给予的支持，特别感谢林贤治先生的热情和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

2008年5月25日

目 录

001 / 序/路莘

001 / 回忆黎烈文

023 / 许寿裳先生之死

026 / 傅东华二三事

036 / 姜椿芳这个真人

039 / 想起了吴强

052 / 小记姚奔

056 / 缘分虽薄,仍难忘秦似

067 / 不能不说秦牧

085 / 怀念高放
095 / 的确是萧军
105 / 绀弩片记
111 / 满涛片记
116 / 却说张中晓
137 / 写在阿垅《第一击》后面
152 / 回忆童晴岚
161 / 温枫其人
164 / 枝蔓丛丛的回忆
195 / 我和胡风的认识和交往
203 / 我在押期间和释放以来的思想
207 / 关于我的家庭
210 / 出狱后与父亲的通信
212 / 附录 同行的日子/路莘

回忆黎烈文

听说沉名已久、既成古人也有二三十年了的曾为《礼拜六》主编之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于今忽又声名鹊起，便——大抵势所必至吧——立即记起来了超一甲子以前从这个礼拜六派人接过来加以改弦易辙、除旧布新了的《申报·自由谈》的主编人黎烈文。

听来的几个故事

我知道有一个黎烈文却并非看过《自由谈》。最初知道这个人是从鲁迅的《伪自由书》，随后则从《译文》和《中流》以及J. 罗曼的《医学的胜利》、A. 法朗士的《企鹅岛》、P. 洛蒂（原译似是“罗迦”）的《冰岛渔夫》和《梅里美选集》；中间还从《作家》或《中流》看到十二个作家抬鲁迅先生灵柩照片里模糊的黎烈文形象。那时期，我还是个才从教科书里读到“好读书不求甚解”便颀颀地引以为一种信条的少年。直到四五年后，即1940—1941年，

我在桂林和建瓯，陆续又读了他翻译的泰纳的《红萝卜须》、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纪德等人合集的《邂逅草》、不记得作者名字了的《期待之岛》和不记得书名了的莫泊桑的小说，还重读了正是“西装革履”了的《世界文库》单行本的《冰岛渔夫》，才凭着浅薄的文学知识，对作为翻译家的黎烈文有一个虽然未定的——说夸大些——认识，即是，他似乎有什么就翻译什么地把三个基本文学派别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翻译过来，似乎他没有确定的文学思想立场。但这又有好处，即对于什么翻译作品都想读的人来说是正合需要的，不仅是单从他翻译的作品会就能获得一种比较和辨别派别不同的文学思想、方法和风格的方便，也许这正是他从事翻译的旨意吧。……

1941年3月间，我匆匆从建瓯出走，准备要去桂林，路过永安时留住了三四天。一天，摆脱不了久不相见了，在黎烈文当社长的改进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十六岁就出版诗集《星之歌》的郭英的好意，被他和他的同事、写小说的姚隼带着，徒步到七里外的蛤蟆村他们编辑部去吃“草包饭”。战时福建省会的这个小城郊外早上的太阳仿佛发了霉，一副又愧赧又沉郁又歉疚的情态。这或许由于旅费难筹而情绪不好的我又听说他们出版社社址在城里的污沟街而觉得他们以至他们出版社倒霉在齷齪里的缘故。事实上，我想说句“黎烈文和你们准是想吃天鹅肉，想要做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莲”的笑话也说不出来。直到郭英打了一下我的胳膊，说“你怎么啦，告诉你两遍我们就到啦你都不响”，姚隼跟着问：“你听见了什么吗？”我摇摇头。姚又问：“你在报馆里工作，没有听过印刷机响吗？”我这才听见了“咯哒咯哒”的印刷机的哭叫，却回了他们一句“你们大概初入鲍鱼之肆，听那破机器的声音响像听漂亮的女高音”，说出了也就觉得无聊。这唯一一次的蛤蟆村之行也真的是无聊，只除了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却又无从反驳的两桩事还有点——怎

么说呢——没意思的意思。这两桩事之一是，郭英说，社长黎烈文规定，谁找他都不许敲更不许擅自推开哪怕一小条缝儿他的办公室的门，都须在门外喊“报告”，须听他叫“进来”才可以推门进去。我不信，我认为把黎烈文说得像是打足官气的部队长，是郭英吃多了草包饭吃得人也变成“草包”了的卤莽瞎扯。可是姚隼肯定郭英说的是事实，郭英还说“他这个规定其实很好，人家有要紧事也不找他了，等到看到他在外边再说”。这越发是“草包”话。我想“将”死他的“军”，问了“雨田去找他呢”，郭英答：“不知道，没有看见过。倒是有一次看见王西彦敲他几下门说了一句‘我是西彦’。”我看看姚隼，姚隼不能作证明人了，说他没看到过。但他立即说出了“这里有许多人都知道的”另一桩事：“有个晚上，王西彦和黎烈文关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住在这里的人都听见了，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总之，一件奇事。”我问郭英，郭英说他那时还没来，后来听说过。我于是说：倘若这都是真事，那么，我想黎烈文这人的感情态度大抵是坚实而明朗的，无论表现为冷峻还是表现为热烈。

1943年夏季，我在永安《大成报》工作了一段日子，偶尔听先前高年级同学、在改进出版社编《现代青年》的赵家欣说起，黎烈文已和许粤华（雨田）结了婚。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大约两个月，重庆的“秋老虎”放肆肆虐的日子里，我工作所在的《新中华》杂志编辑部从市内热闹的督邮街搬迁到郊外冷静的李子坝中华书局编辑所那座楼里。我也住到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了。不知怎么，住在这楼上一个小房间的编辑所所长金兆梓先生似乎特别和我“有缘”（这话是编辑所的张先达说的）：天天，无论我坐在哪个位子上，坐在固定位子上的金先生总是面向着我说话。他那金华语音的普通话使我连听带猜也懂不了他所说的大抵是文史掌故的话的一半。却不好像别人那样吃了

饭放下筷子就走，直陪到他喝罢酒开始就着残汤剩菜吃没了热气的饭。有个周末，晚饭时少了四五个人，另外多了一个金先生的老朋友、我在督邮那时见过的丁晓先先生。我窃喜这回可以不当金先生的旁听人了。不想刚吃完饭就忽而听见两个酒人在说沈雁冰。丁先生说“这个朋友前年出了一本《霜叶红似二月花》”，金先生说“哎，你弄错了，樊川这句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丁先生说不是他的错，‘是这个朋友强改古人句，恐怕是怕太红了’。虽然，这个‘强改古人句’的故事我早就听钱歌川说过，然而，‘恐怕是怕太红了’却新鲜而幽默，引起了旁听下去的兴趣了。但他们往下却一个说‘还有一个耿济之’，一个说‘还有一个胡愈之，还有一个王统照’。他们是在互相补充地数说当年文学研究会人，我的兴趣下降了，想走，还没动，又听见丁先生说‘还有一个蒋百里，差一点忘记这个大军事家了。’我于是又听下去，想听听还有哪些我所不知道的。金先生可问起‘数了多少人啦’来了，可又不等回答就说‘差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同我啦’。我先前已听说过丁晓先是文学研究会的，这下知道金兆梓也是，有点诧异。金先生突然问我：‘你知道还有谁？’我说我知道的人很少，他们一定都说过了。这时‘咚’地一响，丁先生把酒杯子起劲地搁在桌上，说，‘对了，那时还有一个就像他这样年青的，你记得吗？忘记了？就是后来跟鲁迅一起的黎烈文啊。’我忍不住问‘黎烈文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丁先生回应：‘是啊。他本来在商务印书馆当个学徒，才十六七岁吧，写起小说来了，还真写得不错，后来出版了一本集子，叫什么？’他转过脸去问金兆梓，却自己想起来了，说，‘叫《舟中》。好像就是这时候，他当编辑了，也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会里数他最年轻了。你认识他？’我说我只是读过几种他翻译的书。丁先生就问：‘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他翻译的头一本书，看过吗？’我没有看过，而且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丁先生刚又说了一句什

么，金先生又催他喝酒，立即自呷了一口，说了一句“争说往事，白头更少年”——却是丁先生“翻译”给我听的。他们随即转而谈起金华哪个诗人，咏起诗来了。我于是又成了——无心旁听了的——旁听人。

三个月后，我已在吴清友当所长的宣怀经济研究所，正在天天到《中央日报》馆资料室翻查早年《东方杂志》上有关盛宣怀的材料（让由中苏文化协会的郁文哉介绍来的两个女青年抄录在资料卡上）的日子里。一天，我回来得晚了，一进兼作客厅的饭厅便看见吴清友和聂绀弩在那里谈话，看见我了的吴清友对绀弩说：“喏喏，他回来了，你问他。我要先走了。”大步赶路回来还喘着气的我莫名其妙地看看绀弩看看清友，绀弩说看来我还没有吃饭，先吃了再说。可是我盛了微温的饭坐到餐桌边，他也走过来，说“吴清友走了”便也坐了下来，立即问道：“你知道黎烈文在哪里？”我奇怪了：不仅不解他为什么向我问起黎烈文，还因为他问得好像我准定知道黎烈文的行踪。我张口就冲出一句“我怎么知道”。他似乎也奇怪了：“你不知道黎烈文？吴清友刚才还说你来重庆以前在永安，认识黎烈文的。”我来不及吃饭就回答他吴清友的话是想当然的。随后我告诉他，我在过永安，还到过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可是不认识黎烈文，连见都没见过。我甚至把并不相信的从郭英听来的找黎烈文要喊“报告”的事也告诉了他。绀弩笑了起来，说：“他是有点官老爷的神气。我刚看到他那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有官老爷的行为。他不大说话，似乎冷淡，也不是摆架子，是他稳重。像你这样，心里存不住事，嘴上没遮拦，同他谈起话来很快就会了解他也是热心人了。但是，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没有福建朋友给你写信提到他吗？”我记起来了：几个月前，即1945年圣诞前夕我离开《新中华》当天收到在福州《民主报》的朋友叶康参的信，说到台湾光复，福建大员们大都涌

往台湾，改进出版社却将“关门大吉，我们的几个朋友又面临饭碗问题了”。我于是说给绀弩听，并说“也许黎烈文也去了台湾。”绀弩沉吟半会儿说出“不会回上海吧”这个未必是问我倒像是问黎烈文的话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忽然寻问黎烈文，他说：“是储安平想着了编《中流》的人，向我打听的。好了，我拿你的话回答他就行了。……”

1947年10月，我在台北，由先是我父亲郑之翰的学生后是台湾闻人李万居的学生施君介荐我去见了即将完成筹备工作、进行试刊的《公论报》的社长李万居先生之后一两天，也将参与编辑《公论报》的朋友周铮带我去会见当主笔的、曾是改进出版社编撰的倪师坛。如果我没记错，那就正是这次在倪师坛那里看到黎烈文的笔迹——他书写的将制版作为报头的“公论报”三字。看着看来很用心很认真写出的这透着斯文秀气的三个字，我想，它显示这个人的一个性格内容吗？但我不能给自己任何回答。过了一个多月，报纸已是试刊并正式出版了些日子了。一个正午，李万居找了我在他家外厅“个别谈话”。稍为听了我的回答他关于我的经历和爱好的询问后，大出我意外地对我说起他的一些经历和爱好来，并在叙述里带出了黎烈文。我从而知道：1925年“北伐”以前他正在法国，1927年严冬时节和新到法国不久的黎烈文相识。“烈文的祖先在台中当知府时候发生甲午战争，日本占领台湾时参与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军民联合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使烈文对陷在日本奴役下的台湾人民抱有关切的同情。”

学政治经济的他则由于爱好文学而在文学、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上“同黎烈文总有共同的认识和见解”，因此，先后同住异国五六年的一个台湾人和一个湖南人成了相知甚深的朋友。1945年尾，他，李万居，从重庆回到台湾，当台湾参议会副议长；他，黎烈文，隔年春天从福州来到了台北，却被陈仪“暂时安排”为行政长

官公署的闲职——参议。“恰好参议会要办《新生报》,”李先生说,“要我主持,我就邀请烈文当总主笔兼副社长。”“二·二八”后,陈仪下台,魏道明来当省长,“《新生报》受到的限制不断加严,我不干了,决定自办《公论报》。烈文本来就厌谈政治,这时更是嫌恶政治对言论的钳制,与其办报还不如去当个教师能够洁身自好,到台湾大学当教授去了,也有工夫写作和翻译了。”就由于李先生谈了黎烈文,我对他说我读过好些黎先生翻译的外国小说和戏剧,从而两人又谈了法国文学起来。看来他很有兴致,直谈到留我和他一同喝威士忌、吃晚饭后才让我走。

虽然已经听说了这么些故事了,我对黎烈文其人还只能说是知之甚少。但我也并没有了解他这个人的想法,也不曾想要和他相识。

我却随即认识他了。

初识

1948年春节假日里或假日过了而春节气氛依然很浓的一天下午,李万居的年青的妻舅、在报社经理部管财务的钟国元(?)忽上三楼宿舍找我说“李社长请你过去坐坐”。我放下“无聊才读”的一本武侠小说,就“过去”即到经理部隔路对角的李家去了。被一个不说话只作个手势的老妇人带领着走拐了几个弯的廊道到那里边一个敞亮的客厅,便看到李万居正在给一个像他那么胖的客人斟咖啡。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放下咖啡壶就站起来了,那个客人也站了起来,我感到稀罕。李先生向我说“这就是黎先生,黎烈文”,却没向黎先生介绍我,等我们握过手,他才说“坐吧”,黎烈文已同时对我说“早些时候听说你编过几种文学报刊,喜欢《冰岛渔夫》那样的小说”。我还没回答,李先生已对他说我“对法国文学

很熟悉”，随即问我咖啡要加什么酒，我只好先回应李先生，然后回应黎先生，说我读得比较多的其实是 19 世纪俄罗斯的作品，这在客观上可能是由于翻译过来最多的是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的作品。“法国作品读到的也有好些，可不敢说熟悉，李先生说的是鼓励我的话？”黎先生于是问我读过哪些法国作家，我才说了几个，说到罗斯当，他就“好、好”地说“这就不错了，读过这个作家就说明读过许多法国作家。《西哈诺·德·倍若拉克》吗？”是的。可我也只是读过这个作家的这一部诗剧。不记得译者是谁，也记不清是不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倒是记得封面上把罗斯当错成“曷斯当”。“后来读过两部法国文学史，却没有提到这个作家，是因为他在这个诗剧里嘲笑了莫利哀吗？”李先生说“这恐怕是一种原因”，黎先生说：“罗斯当是 19 世纪末那时代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叛徒，他似乎倾向于恢复浪漫主义，但又反对浪漫主义的美化主要人物的古典主义传统。他的英雄不是相貌堂堂英俊潇洒，而是丑八怪，像西哈诺；他的美人愚蠢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人，像洛克沙娜。他嘲笑莫利哀只在莫利哀是宫廷装饰师，一个时期里还是路易十四的宫廷戏剧家，有几个戏剧是为路易十四演出的。他还有一部《幼小的鹰》，也很精彩。可是他人缘不佳。你记得吗？”他对李先生说，“我们在巴黎谈论过罗斯当写西哈诺死于被杀，好像他意识到自己将被文坛埋没。”李先生说他记得，却立即换个话题，说他们那时更爱读夏多布里昂和梅里美，“大概我们那时喜欢浪漫主义，可是不大喜欢雨果。”黎烈文又笑了，说“我们那时就像他这个年纪，”又回过头来问我，“你喜欢不喜欢雨果？”我读初中二年级时读过《万有文库》本的《可怜的人》（李先生说他不知道雨果有这部书，要不不就该是《苦难的人》，黎先生说这书是伍光建翻译的）。那样的故事，我不喜欢。后来在重庆从一部法国文学史看到它译为《悲惨世界》，说是雨果的代表作，恰